

“先生們”之劉再復：文化相伴，沉穩而淡定

著名文學評論家，《人民日報》資深記者 李輝著文

剛剛走進二〇一七年，來京的陳傑女士送給我一個好禮物：《兩度人生——劉再復自述》。這是柳鳴九先生策劃的一套“思想者自述文叢”，由河南文藝出版社推出。陳傑是出版社總編輯，送我這樣一個禮物，再好不過。

快三十年沒有見到劉再復先生了。人在天涯漂泊，卻時在念中。令人高興的是，二〇一六年十月，一位友人前去參加香港書展會與劉再復見面，特地請他代為轉交兩本拙著，另有一九八八年我與他的幾篇訪談錄。很快，收到他從香港發來的郵件，對我厚愛有加，令人感動：

李輝兄，托志明兄帶來的大著《巴金傳》等兩種已收到，謝謝。……在海外27年，倘若見到你的文章，我都拜讀。謝謝你還給我《人民日報》的相關材料尤其是你的采訪錄，我正苦於找不到。我到香港科技大學“客1座”已兩個多月，一月底返美。在洛磯山下，我已習慣孤絕的生活，於象牙之塔中，讀書反而更有心得。七十五歲了，該說的話就說，不情1願說的話就不說，這也算是得大自在了。

劉再復 11月13日，香港清水灣。

不久，劉再復又托人帶來書信與一冊香港三聯書店新作《吾師與吾友》。信中特地提到，這本《吾師與吾友》與北京三聯的《師友紀事》，略有區別。捧讀來信，又見手跡。與劉再復認識是在一九八四年，算一算時間，三十二年如此飛快地過去。

劉再復生於一九四一年，認識時他才四十三歲，正值年富力強風華正茂之際，第二年，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兼《文學評論》主編。說來也是機緣巧合。我在《北京晚報》工作時，與《文學評論》的編輯王信先生常有聯繫，不時前去編輯部看望，也由此認識解馭珍老師。解老師是王朝聞先生的夫人，之前曾擔任《北京日報》文藝部副主任，此時擔任《文學評論》編輯部主任。去的多了，解老師和王信老師建議我不妨調到《文學評論》當編輯。我求之不得。大學三年級時，我與陳思和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論文，一九八〇年發表於《文學評論》，能夠來此工作當然不錯。我當即向晚報提出申請，未獲批准。現在想來，順其自然也許是最好的選擇。雖未去成，但與《文學評論》的好幾個編輯，都成了好朋友。

一次開會場合結識劉再復，彼此交往，由此開始。這一年七月，劉再復來信並附寄聶紺弩為他所寫律詩一首，另有虞愚先生的《步聶老原韻》一首：

李輝同志：您好！

認識您感到很高興。剛剛讀了你發表在《文藝欣賞》上的大作，過些時候還要好好拜讀您在《文學評論》上的論文。

呈上聶老為我寫的律詩和虞愚老先生《步聶老原韻》的詩。虞愚是有名的書法家，古律詩人，原是佛學院教授，現為哲學新研究員，因明學的研究很有成績。如果能兩首一起發最好，如有困難，也不必勉強。聶老還給我寫了三首絕句，我想給別的報刊。

有空來我家玩，我傍晚極閑。

即頌
文祺！

劉再復

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

聶紺弩的詩，是為劉再復的散文詩集《深海的追尋》而寫，題為《新芽》，發表於八月十三日的“五色土”副刊：“春愁鬱鬱走龍蛇，一度沉思一朵花。天地古今失綿邈，雷霆風雨悔喧嘩。我詩長恨無佳句，君卷何言不作家。深海料難尋野草，彼誅陳腐此新芽。”可見聶紺弩對劉再復散文詩頗為欣賞，評價甚高。

劉再復與聶紺弩都住在勁松社區，兩家相距很近。晚年聶紺弩於1981年出版《中國古典小說論集》。其中，研究《紅樓夢》的系列文章，如《論探春》、《論小紅》等篇，令劉再復頗為欣賞。劉再復以研究魯迅起步，同樣酷愛《紅樓夢》。漂泊海外多年，他完成《紅樓四書》。時隔多年，重回故鄉閩南，他在廈門大學九十周年校慶論壇上他所做的演講，題目便是

“《紅樓夢》的哲學意義”。因此之故，劉再復與聶紺弩一家來往密切。他曾告訴我，正在搜集聶紺弩資料，聶紺弩也把一些資料交給他整理，他準備為此寫一本書。此時的劉再復，精力旺盛，思想活躍，發表《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》一文宣導文學批評方法的變革。《論文學的主體性》與理論專著《性格組合論》，更是引發一場文學理論的論爭。

這一年，劉再復出版散文詩集《太陽土地人》，找出來重新閱讀，仍能強烈感受一個詩人的歷史激情。他寫《王國維之死》，以精粹的詩句勾勒一個人的悲劇：

學術上的啟蒙家，政治上的蒙昧者；新的先驅，舊的忠臣；一半朝前嚮往，一半向後顧戀；在書本上駁斥著陳舊，在現實中恐懼著新生。不可調和的矛盾，凝成了大苦悶，終於撕碎了你的心，漲裂了你的靈魂，並釀成了昆明湖這一節嚴酷的悲劇。（《王國維之死》）

生於福建泉州南安的李贄，對故鄉先賢林則徐、嚴復、李贄、林琴南、辜鴻銘等傾注深厚情感。他寫李贄的散文詩，讀後難忘。他寫道：

我曾譴責我的故鄉，徒有那麼柔美的青山綠水，徒有名聲那麼響亮的江南秀地，竟不能收埋自己天才的兒子，竟不能收埋勇敢的心、抹去孔夫子與道學家神聖之光的手、不顧自己的弱小去頂撞大黑暗的肩膀，竟不能收埋直聲撒滿天下的思想解放的先驅……

但我仿佛聽到墓墳裡的靈魂在辯護：請不要怪罪故鄉，請理解故鄉不能收埋遺骨的悲哀。那時的文字獄株連得那樣廣，任何帶有真理的文字都難以倖免，黑暗沉重得可以把高山壓彎，就是三個故鄉的懷抱，也保護不了我的生，阻擋不了我的死。我該用什麼來安慰這正直的靈魂？我只有告訴他：思想家死了，但思想並未同死。……這郊外墳前的小徑上，不是依然走來踏著小草的一代又一代人嗎……

（《墳前的小徑依舊常有人來——訪李贄墓，懷李贄》）

我曾幾度前往泉州，曾尋訪李贄故居，也曾在通縣拜謁李贄墓。現在再讀此文，對劉再復的故鄉情結與歷史憂思，有了更深理解。

難忘一九八五年胡風去世之際引發的風風雨雨。眼見熟悉的前輩相繼辭世，我忽然意識到，如果不抓緊時間請胡風的朋友們回憶往事，很可能諸多歷史場景與細節就會隨之消失。我請教恩師賈植芳先生、曾卓先生等，得到他們的支持，就在這一年，我開始四處尋訪胡風的朋友們。當時並沒有想到會寫一本書，只是覺得，以口述歷史的形式予以留存。一九八七年，走進三十歲的我，才意識到有必要將之寫出來，梳理盤根錯節的歷史冤案。歷時一年多，數易其稿，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完成《文壇悲歌——胡風集團冤案始末》一書，率先發表於第四期的《百花洲》雜誌。

此時，我正與劉再復做一次筆談訪問，寄回清樣時，他對《文壇悲歌》予以鼓勵：

李輝兄：

呈上清樣，有些地方不得不改，請您再克服一下困難，真抱歉。這種對話影響太大，不得不如此。

《歷史悲歌》，我讀後深為感動。您以正直的心靈唱出了一曲歷史的悲歌，這是您人生的一次重要完成的重要塑造，一切經歷過苦難的知識份子都會感謝您的。您的作品資料很豐富，分寸感掌握得很好，對歷史事件的駕馭是成功的。您的作品還有一點長處，就是通過胡風，您把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展示出來了。我希望今後會有出版社出版一套歷史文獻的紀實文學大系。

65題答問，我匆忙趕寫了一個初稿，請您再斧正，我還要加工。

敬頌

撰安

劉再復 一九八八年十月

人民日報出版社決定出版《文壇悲歌》拙著。誰來寫序？首先想到劉再復，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。他研究魯迅，而胡風曾是魯迅晚年最信賴的年輕朋友。他對歷史有透徹的理解，對文壇錯綜複雜的關係、脈絡，也有自己獨特見解。歲末，他寄來序言，題為《歷史悲歌歌一曲》。序言中，他對我厚愛有加，令人感激。“這與其說是駕馭歷史的能力，不如說是履行歷史責任的正義感”，他的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，也是這些年促使我繼續非虛構寫作的一種動力。

在序言中，劉再復用大量篇幅談胡風與魯迅的傳承關係：

我翻閱了這部書稿後，心情一直沉重。儘管我與胡風毫無瓜葛。胡風在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藝運動，信奉馬克思主義，而且追隨魯迅（他對魯迅的追隨又是非常自覺的）。他作為魯迅的自覺的、堅定的追隨者，最早發現機械決定論將導致革命文學走入死胡同。照理，他走入新社會後是會很愉快的，但是他卻遭到空前的痛苦。這除了社會的原因外，還有他個人的原因，他太認真、太執著、太熱切了。他對革命文學總是那麼關注，那麼熱情，為了社會主義文學事業，竟然寫出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。且不說內容如何，能寫出三十萬言的意見書，而且是充滿著建設性的意見，這要花費多少心思呵。既有敏銳的“革命文學”危機感，又有切實的建設革命文學的責任感，這是多麼可貴呵。但這種危機感與責任感，卻使他遭到不幸。胡風的人格是很特別的（其實正是很正常、很健康的）。無論是從知、還是從情、還是從意的角度來看，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輝。從“知”上說，他提出“到處都有生活”的問題，可見他對文學藝術的真知灼見。這與某些鬧騰了一輩子文學而不知文學為何物的“文學理論家”相比，實在是高明很多。從“情”來看，他確信，他的“精神奴役創傷”的命題，包含著最深摯的愛和同情。從“意”來講，他的堅忍是不言而喻的，他的“主觀戰鬥精神”，正是一種意志力量所激發的韌性精神。他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他的心理構成顯得比我們正常、健康、成熟。（《歷史悲歌歌一曲》）

將近三十年過去，這些論述，依然顯出其智慧，充滿對人的深刻同情，對歷史的透徹理解。

拙著於一九八九年春天出版，書名改為《胡風集團冤案始末》，特意請黃永玉先生題簽。拙著出版後，曾在中國社科院大樓的一間大會議室舉辦研討會，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姜德明、劉再復等不少人與會發言。劉再復為拙著寫序題為《歷史悲歌歌一曲》，“歷史悲歌”顯然比“文壇悲歌”更有分量，故在香港、臺灣分別出版時，更名為《歷史悲歌》。幾年後，日本岩波書店將之翻譯，分為上、下兩冊出版。在我而言，終於完

成一段頗為艱難的歷史敘述，對所有幫助我的人，深為感激。三年之後，一九九二年春天，我在瑞典將近兩個月時間，一邊在大學講課，一邊雲遊北歐，對瑞典漢學狀況大致有一印象。正是從馬悅然和蓋瑪亞幾位漢學家那裡，知道劉再復的漂泊情形。劉再復早在一九八八年應邀訪問瑞典，出席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，歸國後，我曾與他有過一次瑞典之行的對談。沒有想到，我的第一次出國，就是瑞典。我在瑞典期間，劉再復不久前剛剛離開，未能謀面，好在通了一次電話，瞭解他的大致狀況。

同年年底，蓋瑪亞訪問北京，告訴我劉再復又回到瑞典了。返回瑞典時，我請她帶去一信和一盒茶葉。很快，劉再復寄來自己印製的新年賀卡。照片上，背後一片金黃色樹葉，映襯剛剛五十出頭的劉再復，看上去他仍如過去一樣沉著而淡定。時隔三年多，再見熟悉筆跡。“請蓋瑪亞帶來的信和茶葉收到了。謝謝你在我漂流海外的歲月中總是懷念著我。”好在有文化相伴，有鄉愁相伴，有引為知己的學者、作家與之相伴。如他在《兩度人生》中與吳小攀兄的對話所言，與李澤厚先生的深入交往與對話，對高行健作品的深入研究，《紅樓四書》的寫作，他從來沒有寂寞。二十多年雖然沒有見面，他出版的書我搜集若干冊，《告別革命》（與李澤厚合作）、《魯迅論》、《人論二十種》……讀書如讀人，曾有的友情依舊溫暖於心。沒有想到，漫讀《兩度人生》，蔓延出這些零零星星的往事記憶。

三十年時間，就這樣流走了。

完稿於2017年2月2日，丁酉年初六，北京看雲齋。